

亲历者讲述良渚考古背后的故事

——《我们这样发现良渚：良渚考古口述史》前言

王宁远

考古工作提供的成果，多是出土文物以及报告、论文，都属于“果”，那它的“因”是什么？考古工作很多生动的过程和细节，不会出现在报告和文章里，只会存留在发掘者的回忆之中。把工作中的所思所想和过程记录下来，也是学术史的一个重要部分。

2000年，我开始从事良渚考古，良渚遗址的考古掌故以往零零星星听前辈同事们讲起过。不同人的表述有出入，也缺乏系统性。2007年良渚古城发现以后，媒体对良渚的关注度大大提高。有很多人请我们讲述良渚的考古故事。当时我有过一个想法，想请反山、瑶山这些重要遗址的领队本人到遗址现场做回忆与讲解，同时把当时发掘队的成员都叫拢，现场相互补充纠错，记录下来当作一个标准版的发掘记，这样会更加准确、完整、生动。当时我开始做过一点口述史的尝试。摄录了技工祁自力讲述勘探寻找良渚城墙的经历。为了了解莫角山和古城地貌的变迁，找了一个亲历的民工讲述古城西墙白元畝土墩“文革”期间取土的过程；还找了大观山果园的退休老职工回忆当年对莫角山地貌的改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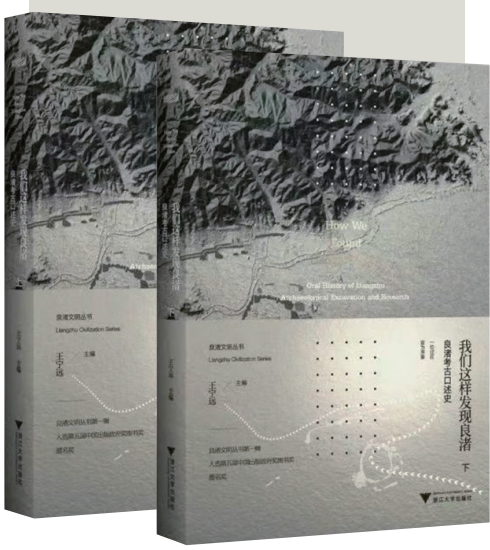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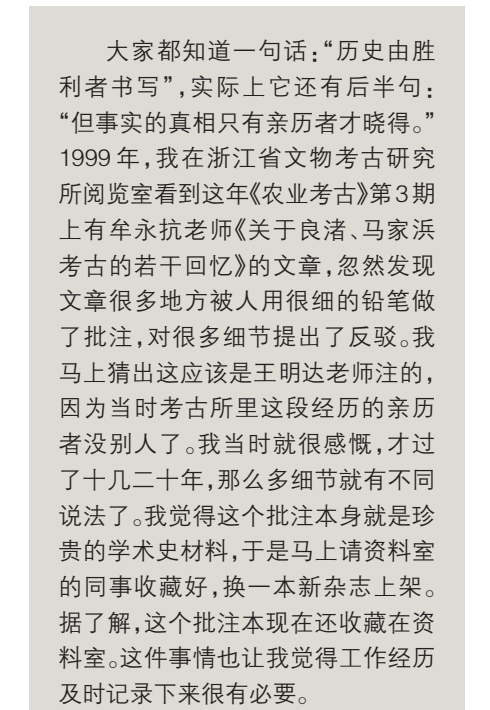
2013年后，因为建古城遗址公园，里面的村子都搬迁了，反山和莫角山与发掘时的环境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这个劲头就没有了。后来牟永抗老师去世了，我又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不能拖。当时余杭区政协要组织写一批良渚考古相关的回忆文章，所以我在写《良渚水利系统发现记》的时候，就把王明达、赵晔、丁品、方向明等先后参加过塘山调查发掘的同事都请过来，沿当时发掘点走了一遍，大家现场讲述，我记录下来，回去再核对档案资料，据此整理、撰写水利系统发现史。这种记录方式比个人的回忆准确性高，但是要兴师动众，后来也就没有机会再做了。申遗过程中，有一次在八角亭工作站，负责良渚博物院展陈设计的复旦大学高蒙河老师曾经很正式地建议我们说，良渚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江南小镇，经过了八十多年几代考古人的努力，最后走到了今天，是一个很成功很典型的案例，良渚考古是全面的考古，不仅要把考古成果介绍给大家，还应该把整个考古思路、过程、方法等做全面的记录和总结，给全国考古界做参考和借鉴。我当时深受启发，意识到之前我们有点自娱自乐的记录，它的意义可能不仅仅局限于良渚考古本身的学术史领域，还可以有更大的价值。正好浙大出版社的王雨吟编辑约我写个良渚考古口述史，我马上就答应下来了。我是项目开始后我有点点后悔，因为纠结于口述史的真实性问题。最初设想是在全体发掘人员集中口述的基础上，再去核对档案和文字材料，把细节尽量还原到真实状

态。但是发现做起来实在太难，只能退而求其次，请发掘领队（或执行领队）主述。领队当然是对细节过程了解最多的人，但是采取他一个人主述会不会有各种原因导致回忆偏差？我曾经很长时间纠结于此，缺乏信心。后来我自己经历一件事情，对这点终于释然。

2019年7月6日那天，我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世界遗产大会现场，亲身经历了良渚成功列入世界遗产的全过程。但是等我回国后，偶然看了会议的实况录像而获得的感受，和我现场的感受居然有很大差异。从直播录像剪辑的画面看，我们所有人都是在会场听着大会主席用英文宣布申遗成功，看见敲钹子，然后大家开始欢呼。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都坐得很远，看不清主席台，大家戴着耳机，听到的是干巴巴的中文同声传译，并不是大会主席的英文原声，我们欢呼是有延时的。这件事情就启发了我，那种从上帝视角俯瞰、全局回顾的历史和我们亲历者在那个时刻切身感受到的那一个局部的历史是不同的。它们是对同一真实事件不同角度的观察和叙述，但都是真实的历史。所以，我对口述史中叙述者可能存在差异，就不再纠结了。此后的工作就按部就班地开展起来了。

我们记录的方式采取线下或线上录音采访，由被采访人自由讲述，几乎不加以干涉。然后用语音识别软件转成文字，再调整下顺序形成初稿，以便符合阅读逻辑，避免叙述者天马行空。初稿提交给叙述人修改后，最后定稿。对于讲述内容，除明显的时间、地点等错误硬伤做了备注外，对文字不刻意做核对和修改。录音文字大部分由我整理，姬翔、宋姝、张依欣等也做了部分工作。口述史内容最初计划只涉及良渚最重要的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古城、水利系统等几个“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来发现如果再补充点早期施昕更等的工作，以及良渚庙前、卞家山等其他重要项目，实际上可以涵盖良渚八十多年的整个考古历程，所以就扩大了口述史的内容范围。

实际工作中，我是先找王明达先生录过好几次，断断续续延续有一年多时间。后来专门找了刘斌、赵晔、丁品、芮国耀、陈欢乐、葛建良等做了录音。牟永抗先生这期间已经不在了，我根据他早年的录音整理了部分相关内容。施昕更的部分，是根据姚今霆编撰的施昕更年谱、西湖博物馆董秉茂馆长的回忆文字，加上施昕更发表的文字和书信来梳理，最后我来做一个整理。这个时候我发现良渚考古的脉络已经比较清楚了。又考虑到在良渚古城发现以后，我们还做过很多的多学科研究，对认识良渚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这些多学科研究有很多其实是



我自己负责或参与的项目，过程我比较清楚。所以又把动物、植物、遥感、地质、水利等方面的研究内容纳入口述史中。先后采访了董传万、罗以达、袁俊平、赵晓豹等外单位的参与者，以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郑云飞、姬翔、宋姝等科技考古的同事。国际合作是良渚考古的重要内容，其中以与日本金泽大学中村慎一先生领导的团队合作最为系统。但是因为疫情，这两年他们也来不了，所以只能以我的角度做简单的介

大型工程中的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成果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考古发现·河北卷》序

徐光冀

自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河北省即开始开展考古工作，特别是1949年以后，考古学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如阳原泥河湾遗址群，发现距今百万年以来的旧石器遗址至新石器文化早期遗址，从旧石器文化发展的早、中、晚三期，至新石器文化延续不断，是我国考古学的宝库。20世纪70年代，在武安发现早于仰韶文化，距今七八千年的磁山遗址，即著名的磁山文化，是新石器考古的突破。迁安有距今八千年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其后，又在徐水南庄头遗址发现近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及其后的北福地遗址。河北省的仰韶文化，可分为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有密集的分布。先商时期有磁县下七垣遗址，可称为下七垣文化。商代遗址在邢台、石家庄有广泛分布。西周时召公封于燕，西周文化也有广泛分布。战国时期是燕、赵两国的中心地区，有位于邯郸的赵王城、赵王陵，位于易县的燕下都，还有中山国的都城和陵墓区。汉代有著名的中山王刘胜墓及其墓群。临漳邺城遗址是六朝故都，在中国都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西郊有曹魏的墓区，其西北郊是东魏北齐的陵墓区，以及响堂山石窟。宋代有西京大名府遗址，唐宋元时期有邢窑、定窑、磁州窑等著名窑址。河北省蕴涵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和文物，因此在南水北调工程中，尤要保护好文物。

南水北调工程是我国继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之后，又一项大型水利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是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02年开始，以省、市（直辖市）为单位，开始库区及渠线区的文物勘探及局部发掘，收集、形成基础资料，并逐项价值评估，在此基础上，形成初步规划，东线由淮河水利委员会汇总，中线由长江水利委员会汇总，同时水利部成立文物保护前期规划专家组，负责指导规划工作。最后由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形成总体规划（即可研报告）。经专家论证，报国务院审批。为此，2003年6月国家文物局和水利部联合发布《关于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文物保护的通知》。2003年11月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省市做好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2005年国家文物局在郑州召开“全国支援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工作动员大会”，动员组织全国力量参加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工作，全国各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60余家单位参

张文瑞所长编著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考古发现·河北卷》一书，邀我为序，觉得应向业内外介绍工程中的考古成果，慨然应承了。该书在规划的88个项目（实际完成104项）中，选取了52项遗址的考古成果。在介绍每处遗址的文字中，有多幅插图，图文并茂，使读者一目了然。在正式发掘报告尚未全部出版的情况下，研究者可以参考，广大读者也可以了解其概貌，这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好事。

加。参加人员战严寒，斗酷暑，争分夺秒投入文物保护工作，保质保量完成了工作任务。

南水北调河北段文物保护工作与各省市同时启动。其工作量在五省两市，仅次于河南省，位居第二。河北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成立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组织领导文物保护工作。同时成立专家组在工作上予以指导。并于2005年7月30日，在北戴河召开全省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工作会。同时在三峡工程文物保护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各项规章制度如项目法人制、项目合同制、领队负责制、工程监理制、评审验收制等，对文物保护项目经费的管理、领队责任、发掘工地的验收、文物安全、文物交接、资料档案管理等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同时要求渠线范围内的墓葬全部发掘清理，避免文物流失，不给犯罪分子造成可乘之机。工程文保办公室组织沿渠线勘查和局部发掘，2002年至2003年即发现遗址150处，经梳理后立项发掘项目88项。最后超额完成至104项。发掘面积27万平方米，勘探面积和发掘面积均超额提前完成。参加工作的有全国研究机构、大学33家，由于33家单位的通力合作，每个团队艰苦奋斗而超额完成任务，保证干渠按时输水，并取得了重大成果。2010年3月22日至25日，召开了田野工作总结大会，有24个团队进行了工作汇报。现按时代先后，将文物保护成果，简述之。

南水北调河北段干渠，在河北省中南部几百公里的大地上，挖了百米宽的大沟（考古学称探



沟，不过这探沟实在大）。在渠线施工之前，考古工作者在大沟的地面上清理发掘各类遗址，包括从新石器文化、先商、商、西周、春秋战国、秦、两汉、魏晋、北朝、隋唐、宋辽金元至明清各时代的遗址，是河北中、南部的一部灿烂的实力历史。每处遗址都有从早期到晚期的遗存，但各自的重点不同，在这篇短文中只能点到一些遗址的重点之处。

新石器文化 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后岗一期文化）距今约7000年，在冀南、冀中地区有广泛分布，其中容城北城村遗址，是一处重要居住遗址，发掘房址15座，窖穴82处，在冀南磁县一带分布更为密集。其后是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如临城补要村遗址。有意思的是在新乐何家庄遗址见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踪迹，可见庙底沟类型影响之大。滦水大赤土遗址为新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龙山文化（后岗二期文化）在冀南也有分布。

先商文化 有突破性进展，在新乐赞皇、临城、邯郸、磁县均有发现，重要的是磁县南城村遗址有居住址和墓地，内涵丰富，保存完整，发掘墓葬78座。临城补要村遗址先商文化，也很丰富。在渠线之外的居住址和墓地今后须进一步工作，必将有更大的收获。商文化的起源，向为学术界关注，从考古实践来看豫北、冀南地区是商文化起源的重要地区。张光直先生主张商起源于商丘，文献记载多，经中美联合考古，由于该地区为黄泛区，尚未找到相关遗迹。过去冀中地区考古工作薄弱，这次唐县北放水遗址的发掘很重要，应属先周时期，文化特征有其特点，与下七垣文

绍。口述史中古城、水利系统、反山这几个项目，发掘领队曾经发表比较系统的回忆文字，这次就以之前的文字为基础，补充了发掘者口述的一些细节。其他部分是重新录音和整理的，因为瑶山是因盗掘被发现的，考古所介入较晚，所以这次增加了当地政府部门和文物工作者王寿坤、颜云泉的回忆。录音文字整理完以后，经审读和多次修订，确定最终文稿，可以认为是代表了叙述者本人的意思。口述史大致的截止时间是到古城申遗为止，部分延续性的科技考古工作则叙述到2021年。限于篇幅，近年主要由第四代考古人做的工作，比如遗址系统勘探、姜家山、钟家港、北村等发掘工作本次未及收入，还是留待未来由他们自己叙述吧，每一代人都有属于他们的历史。

如果把良渚遗址八十多年的考古史当成一篇文章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起、承、转、合四个段落。我们的口述史就是按照这种逻辑来编排的。

第一个阶段：起。这个阶段是施昕更1930年代发现良渚遗址，并将良渚视为山东龙山黑陶文化南渐的一种文化。如果用一个关键字来总结这个时期的话，是“乱”。因为良渚第一次考古发掘在1936年年底，接下来1937年就是“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件”，很快杭州沦陷，施昕更携带书稿，踏上了逃难的路途，1939年病故在瑞安。所以施先生是赶在战火烧到之前的那一刻，抢一样地把发掘整理工作做完，在流亡路途把考古报告出版的。

1949年至1986年之前，可以算第二个“承”的阶段。整个良渚文化区内早期主要是延续施昕更时代的器物研究。后转入考古年代谱系研究，1959年从龙山文化中区分开来，单独命名为“良渚文化”，逐步建立本地区马家浜-崧泽-良渚的年代谱系。而同为良渚文化分布区的兄弟省市江苏和上海，这一阶段则发现了草鞋山、张陵山、寺墩、福泉山等大墓，确认了原来一直被视为周汉时代的玉器实际属于良渚时代。得出良渚大墓埋葬于土筑金字塔之上的认识。本时期的杭州良渚遗址考古，发掘不多，亮点很少。前辈们几乎白手起家，缺人、缺钱不说，中间还经历了长期的政治波折。这个阶段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难”。

1986年，以反山发掘为标志，良渚考古进入了“转”的新阶段，这是一个堪称“开挂”的阶段。反山之后，良渚遗址一改以往几十年暗淡的表现，瑶山、莫角山、汇观山、塘山等重要发现接踵而来，这些发现都是“七五”或者“八五”期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发掘证实良渚地区是整个区域内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这个阶段的关键字，

可以说是“惊”。而且从反山发现以后，就提出了“遗址群”的概念。良渚考古的研究逐步进入一种整体性的大遗址考古的视角，接下来与它匹配的遗址保护也转向整体性保护的一个正确道路。所以在发现、研究还是保护上，这都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时期，非常契合“转”这个字。

2007年良渚古城发现以后的良渚考古，可以称为“合”的阶段。这时我们已经发现了古城的三重结构和外围水利系统的格局，整合以往的认识，大开大合，把遗址群里这么多遗址点，还原其真实的功能结构，从遗址群时代跨入了都邑考古的阶段。这是对遗址群这种模糊的大遗址功能认识的整合和提高。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宏”。同时在这个阶段以后，良渚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考古了，开始大量利用多学科合力对良渚进行全面的研究，进入全考古的阶段，也称得上是一种“合”。

2019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良渚文明丛书”中，同事朱叶菲有一本《良渚遗址考古八十年》，曾经系统梳理过良渚考古学术史。那么这本口述史可以理解为其的亲历者口述版，对比阅读两书或许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另外，近年电视媒体制作过很多关于良渚考古的纪录片，良渚博物院和媒体公司做过很多短视频，能帮助读者更具象地了解良渚和良渚考古。我们征得节目版权方的同意，在前言部分放上央视10套《探索发现》栏目的《圣地良渚》（上下集，时长78分钟）和浙江卫视《良渚文明》（5集，时长190分钟）两部纪录片的链接二维码，可以先看视频，对良渚考古有个整体认识，再看本书。另外在具体的章节中，也插入良渚博物院和江苏兆物公司制作的短视频，希望对读者了解文中涉及的各考古项目背景有所帮助。

良渚考古人，身处不同时代，性格秉性各异、人生际遇也大不相同。但是通过口述史的整理，我发现我们之间有一个共通的东西，就是“真”——性格上纯真，学术上求真。真情流露，是为真人。这本书里的叙述不可能都真实无误，但是可以保证每个叙述者都是敞开心扉、直言不讳的。对于口述史，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二十几年前的念想，一直不了了之。今天终于一了了之，不禁长吁了一口气。

（本文是《我们这样发现良渚：良渚考古口述史》前言和跋，有所删减。）

《我们这样发现良渚：良渚考古口述史》
作者：王宁远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7月
定价：128元

好保护规划。磁县北朝墓群，位于邺城遗址西北郊，在南北15千米，东西14千米（原记录12千米）的范围内，分布100多座东魏、北齐皇室、贵族墓葬。在南水北调工程渠线规划时，由于西有太行山，东有邺城遗址，避让不开，只有选择地面坟丘稀少的地段绕行。结果仍发掘北朝墓6座，其中出有墓志或志盖的墓3座。有徐州刺史元祐墓，葬于东魏天平三年（公元537年），有墓志。出土志盖的有东魏贵族“魏故兖州元公墓志铭”和“大齐故修城王墓志铭”可知后者墓主人是北齐皇族高孝绪，该墓墓道壁画尚存，两壁各保存仗仗队列13人。以上三墓的发现，对进一步廓清东魏陵区和北齐陵区有重要价值。另在陵区内湾漳营发掘北朝时期烧制建筑材料的窑址，应与修建墓陵有关。

唐宋及以后时期 内丘南中冯墓墓有十六国至唐代墓地，以唐墓为主，墓中随葬有邢窑瓷器。元氏南北楼墓地是唐代大型土洞墓，为李氏家族墓地，排列有序，出土墓志有“东阿令李昕”墓。正定西邢家唐代墓地有“官”字瓷器。磁县北朝群墓域内还发现一些晚期墓葬，其中南来村墓地有保存较好的宋代壁画墓。徐水西黑山金元墓地，发掘一批平民墓，也是不可多得的材料。正定西邢家发掘骠骑将军颜玉家族墓地。永年申氏家族墓地占地60亩发掘明清时代200余座墓葬。

南水北调工程已分别于2013、2014年输水。文物保护田野工作已于输水前完毕，但室内整理和编写报告工作还在进行，这是费时费力的艰辛工作，期望同仁们再努一把力，最后完成。

河北省和其他省份先后举办了南水北调文物保护成果展，取得很好的社会效益。非常期望以后建设博物馆，长期为国家保存珍贵文物的同时，供广大民众参观游览，惠及人民。

大型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经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应认真总结，予以推广。（本文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考古发现·河北卷》的序，写于2019年12月20日，有所删减。）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考古发现·河北卷》
编者：张文瑞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2月
定价：380元